

你穿的学位服从何而来？

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即将到来，校园里随处可见长袍方帽的毕业生在合照留影，还悄然兴起了一股复古风潮——越来越多的学子选择穿上襕衫，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，为一段校园生活画上充满文化韵味的句号。那么，在毕业典礼上穿学位服这一传统从何而来？为什么学位服的颜色五花八门？襕衫与襕袍有何区别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“学位服”的前世今生。

北周首将襕袍纳入官服体系

穿学位服这一传统至少要追溯到12世纪欧洲第一所大学建立的时候。1222年牛津会议，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芬·兰顿提出所有教士都应该穿一种叫cappa clausa的套在袍子外面的长披肩。很快，新建的大学都采用了这一设计，而一般的教士却渐渐不再穿它，于是这就成为了学位服的标志。

《旧唐书·舆服志》中即载“国子、太学、四门学生”需要着“黑介帻，簪导，深衣，青襟，领，革带，乌皮履”。秀才等级需要着“乌纱帽，白裙襦，青领”。到了明清时期，对状元、举人、秀才有了更为细致的规定。以帽子为例，清代时，状元需要佩“金顶，上衔水晶”；举人级别要佩戴“顶镂花银座，上衔金雀”；到秀才级别，则是“顶镂花银座，上衔银雀”。由此来看，着装等级与学识等级相配套的规定中国古已有之。

襕衫指的是上下通裁，衣身下摆处拼接一道横襕的长衣，而“襕”是衣身下摆拼接的横幅布料，也称“横襕”，是这款服饰最鲜明的标识。襕衫的形制脱胎于襕袍，而“衫”与“袍”亦有明确区分：衫为单层，宜于日常穿戴；袍则多为夹层或内填棉絮，适于御寒。

关于襕袍的起源，史料记载与学者论述众说纷纭。综合史料，较认同这一观点：襕袍雏形始于北朝，其后历经两次制度定型——北周宇文护首将其纳入官服体系，初唐马周再度厘定规划，并为其附会传统深衣的文化内涵。

唐初修撰的《隋书·礼仪志》记载：“保定四年（564年），百官始执笏，常服上焉。宇文护始命袍加下襕。”这一记载，亦被唐五代诸多史书沿袭采信。

中国丝绸博物馆藏有一件北朝袍服实物，圆领右衽，窄袖阔身，下摆处特意拼接布幅，且布面纹样走向与衣身截然不同，正是典籍所载的“横襕”。

古人选择横向拼接襕边，亦有实用考量：受古代织机布幅所限，横向裁接更省布料、合乎俭用之道。由此可见，无论文献史料，还是实物遗存，皆可佐证——襕袍至迟在北朝已然成型。

至初唐，衫、袍缀襕正式与深衣礼制绑定，定为士人常服、官员公服。自此，襕袍深度融入汉族民族衣冠体系，历经岁月流转，形制与功用不断衍变。

襕袍为初唐官员日常公服

今人提及襕袍，多默认圆领样式，其实，隋代襕袍已有交领、

圆领两式并行。隋开皇四年（584年）徐敏行墓壁画中，便绘有交领襕袍形象。墓主生活于南朝至隋代，壁画中仆从、车马仪仗所着袍服，下摆皆缀标志性横襕，是交领襕袍的真实写照。敦煌第389窟北壁男供养人画像里，亦多见圆领襕袍身影，足见隋代两式并存、各有沿袭。

彼时的襕袍，无论交领圆领，皆衣身紧窄，衣袖自肩至腕渐次收束，衣长及小腿。从传世图像可见，穿着者多为侍从、平民，形制简约合体、活动便捷，恰好适配日常劳作与出行所需。

《新唐书》记载：“是时（唐太宗时），士人以棠苧襕衫为上服，贵女功之始也……中书令马周上议：礼无服衫之文，三代之制有深衣，请加襕、袖、襻、襪，为士人上服。开唐者，名曰缺胯衫，庶人服之……诏皆从之。太尉长孙无忌又议：服袍者，下加襕、绋、紫、绿皆视其品，庶人以白。”

据此可知，初唐之时，襕衫为士人上等礼服，襕袍为官员日常公服，且以服色划分官阶品级。初唐襕袍承袭隋制，圆领右衽，衣身、袖型及长短并无大变。至晚唐五代，整体形制沿袭盛唐旧制，唯圆领之内常露出交领内衬，或是内衬形制不同，或是领围日渐宽松、内里衣缘自然外露，这一服饰细节的微妙转变，在传世名画《文苑图》中可以直观地看到。

宋代襕袍是读书人毕生所求

及至宋代，襕袍在承袭晚唐五代直袖样式的基础上，衍生出宽博大袖的形制。二式同为官员所用，直袖襕袍为日常常服，大袖襕袍则为朝堂公服，多在上朝理政之时穿着。

传世《八相图》中，可见名臣身穿直袖襕袍，简约端肃；《景德四图》里，朝堂官员一律身着大袖襕袍，圆领阔身，衣长及踝，衣袖宽大几欲垂地。宋代仍以服色定品级：四品以上着紫色，五、六品着青色，七品以下着绿色。南宋赵伯澐（yún）墓曾出土一件实物圆领襕袍，袖宽达95厘米，与古画中大袖襕袍的疏阔气韵全然契合。

与此同时，宋代襕衫也规制成熟、定式完备。《宋史·舆服志》明确记载：“襕衫以白细布为之，圆领大袖，下施横襕为裳，腰间有褶襕（jiǎn），进士、国子生、州县生服之。”其形制以白细布裁制，为进士、国子监生及州县学子的专属服饰。除日常穿戴外，襕衫亦是宋代士人重要礼服，凡冠礼、婚礼、祭祀等庄重场合皆可着用。

更耐人寻味的是，宋代襕衫与襕袍的更迭，藏着读书人一生追求的身份跃迁。时人谓登科有五重荣耀，其中两项皆显于衣冠：便是“布衣而入，绿袍而出”与御宴簪花。所谓“布衣”，是未登功名时所着的白襕衫；一朝及第，便换上官家所赐绿色襕袍。于是，“脱白挂绿”便成了万千书生十年寒窗、求取功名的终极期许。

明代襕袍不拘性别

延至明代，襕袍与襕衫皆迎

来形制上的重大变革，风貌与唐宋已然不同。

明代襕袍多作官员吉服，用料考究，常以织金缎、提花缎等华贵面料裁制，凡时令节庆、寿诞筵宴、婚嫁吉礼等喜庆场合，皆可穿戴。其最大变化在于“襕”的位置：不再缀于衣身最底端，而是移至膝部，且横襕之上多饰精美纹样，世人称“膝襕”。彼时这类襕袍亦不拘性别，女子在婚嫁、赴宴等正式喜庆场合，同样可着襕袍为礼服。

明代襕衫依旧沿用不衰，明初形制多承袭宋制，以素色简约为主。洪武二十四年（1391年），朱元璋厘定衣冠規制，借服饰强化士人身份标识：明令襕衫定为生员（秀才）专属礼服，民间百姓不得随意僭用。彼时襕衫以玉色布绢缝制，宽袖镶黑边，束黑色绦带，配软巾垂带。至明中后期，襕衫渐改为深蓝色，配儒巾，衣缘仍镶黑边，世人亦俗称“蓝衫”。形制上，明式襕衫与宋制差异显著：衣身两侧开衩，且缀有外摆，气韵更为飘逸。

学位服的颜色透露不同信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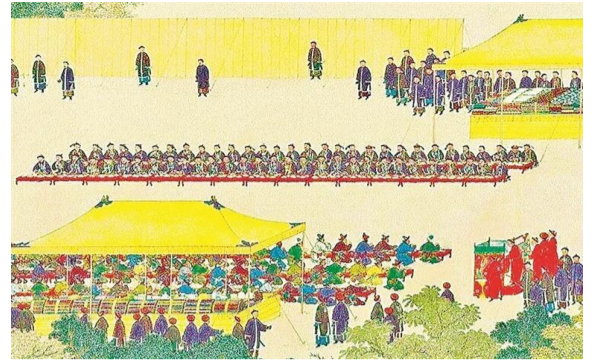
20世纪20年代中期，国人接受了西方教育之后，知识分子对于学位服充满了渴望，中国的学位服由此而生。此时的学位服大多是改良式的，V字领宽松的长袍，前襟左右各饰有黑色的丝绒带，学位帽没有流苏，为平底方形，不难看出与“美派”学位服几乎相同。

学位服由学位帽、流苏、学位服、垂布四部分组成。学位服的颜色通常分两种情况：纯黑色或是两种颜色。如果是后者，一般也是由黑色和另一种提示学科领域的颜色组成。不过，学位服颜色也有一些特殊例子：在中国，学士学位服为黑色，博士学位服为黑、红两色，导师长袍为红、黑两色，但硕士学位服为蓝、深蓝两色。在英国，多数学位服为黑色，但有些学校会把学位服染成象征自己学校的颜色。至于垂布，颜色则通常与某个领域的学科相对应。如在中国，《学位服着装规范》就规定：“饰边处按文、理、工、农、医、军事六大类分别标为粉、灰、黄、绿、白、红颜色。”

值得一提的是，学位服是伴随着学位制度的确立而出现的，但在我国隋唐时期早已存在与当今学位制度相似的学位等级制度，且“学士”、“硕士”及“博士”的称谓早已存在，与当代含义有所差别。

先秦时期“博士”是宫廷学官，通晓古今史事，以备天子咨询，西晋后，“博士”则指专精一艺的学官。“硕士”在文人墨客的作品中时常被提及，泛指品节高尚、学识渊博的人。“学士”一词，战国时期指文人学士，南北朝以后，“学士”是宫廷职官，唐开元年间设立学士院，明清的最高中枢机构内阁也设立了大学士、学士。这些称谓的含义往往与官职相挂钩，与现代的学位制度赋予的含义已经存在很大的区别。

据《海峡都市报》



紫光阁是清代皇帝阅射和殿试武举之所。

清代武科举：考场之外的乡野江湖

提起古代科举，人们脑海中浮现的多是书生苦读、金榜题名的画面；而说到武科举，印象则往往停留在举大石、拉硬弓、舞大刀武艺较量上。然而，回溯历史，特别是清朝，武科举的初衷并非单纯的选拔将才。它从上至下，深深扎根于基层社会，关联着皇权、士绅乃至绿林好汉，成为窥探近代中国基层变局的一扇窗口。

清朝设计武科举制度，本意是通过统一的考试配合身份奖励制度，将民间的尚武之才纳入国家体系，让其为国效力。但随着时间推移，这种制度在不同地域结出了截然不同的果实。晚清思想家魏源曾对当时的文武风气有过一段生动的描述。他发现，在江南的苏州、松江、杭州、嘉定、湖州等富庶之地，文科举报名者成百上千，而武科举考试却连名额都录不满；但到了江北的徐州、寿春，或是浙东的处州、金华，情况则完全反转，这里文试寥寥，武试却异常火爆，当地人“征调则争先，招募则云集矣”。

为什么会如此巨大的反差？这绝非简单的重文轻武所能解释。各地武科举的风气往往与当地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。在那些应试武科蔚然成风的地区，往往也是民风强悍、盗匪出没之地。比如浙东沿海地带，岛屿星罗棋布，洋盗海寇时常滋扰。在官府军队无力庇护的情况下，沿海百姓不得不“自筹保卫之方”，家家户购置刀枪，操练拳勇。在这种准军事化的生活状态下，民间结社与习武成风。对这些地区的豪杰来说，考取一个武科功名，不仅可以光宗耀祖，更能在乡土社会中获得合法的话语权和庇护力。于是，一个特殊而复杂的群体——“武绅”在清代基层社会中崛起了。

太平天国运动后，清朝的军事体制逐渐崩坏，维持地方治安的重任落到了由地方士绅组织的团练肩上。那些身强力壮、精通拳脚，且拥有武举、武生头衔的士绅，自然而然成了这些武装力量的首领。他们的身份极具弹性，游走于官、民乃至盗的灰色地带。据史料记载，在晚清的台州沿海，流传着“多一武举即多一盗魁”的说法。这并非说武举人天生就是强盗，而是因为当地亦民亦盗的现象比较普遍。盗匪为寻求庇护，往往会拉拢甚至胁迫有武科功名的人入伙，尊其为首，以此作为免祸的护身符。

而在更多时候，武科士绅凭借自身的武力和官方身份，在官府与绿林之间玩起了微妙的平衡术。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，山东巨野县发生了一起“夺马案”。当时，绿林头目王朋攻打附近的兵勇营地，起因竟是3个当地的武生牵走了王朋的马匹，交给了兵勇头领并拒绝交还。这3个武生声称是误将绿林头领的马当作官马牵走。这背后大有玄机——武生们显然平日就与绿林、官兵有瓜葛，在发生利益冲突后，他们巧妙地利用官方力量来保护自己，展现出在复杂势力中左右逢源的生存智慧。

到了清末，武科士绅更发挥了缓冲社会矛盾的作用。在义和团发源地之一的山东冠县梨园屯，有一个名为志合团的十八村乡团，分为南北两团，而负责把控局面的团总，清一色是当地的武科世家子弟。其中，南志合团的骨干张伦元、张际贵、张际霖3人都是武举人。在那个极其混乱的年代，这3位武举人展现出了极高的平衡手腕。在他们的斡旋下，义和团、教民以及官府保持了相对的平衡状态。事后，山东巡抚甚至专门感谢这几位武举人，认为正是他们居中斡旋，把义和团和天主教的矛盾“管下了”，稳住了地方的局势。

从台州沿海的“盗魁”，到巨野县的“夺马武生”，再到山东冠县的“乡团团总”，晚清的武科士绅们在清代的基层社会编织起了一张庞大而柔韧的网。他们既是朝廷在乡野的功名代言人，又是民间武力团体的实际掌控者。

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），清廷正式下诏，废止武科举。这项绵延几百年的制度就此落下帷幕。它的消亡，固然是因为大刀长矛在洋枪洋炮面前黯然失色，更是因为在近代社会的惊涛骇浪中，它所代表的那套皇权治理逻辑已走到尽头。武科举虽然退出历史舞台，但那些考场之外的乡野江湖与武科士绅们，依然在随后更加激荡的民国初年继续书写着属于他们的草莽传奇。据《光明日报》